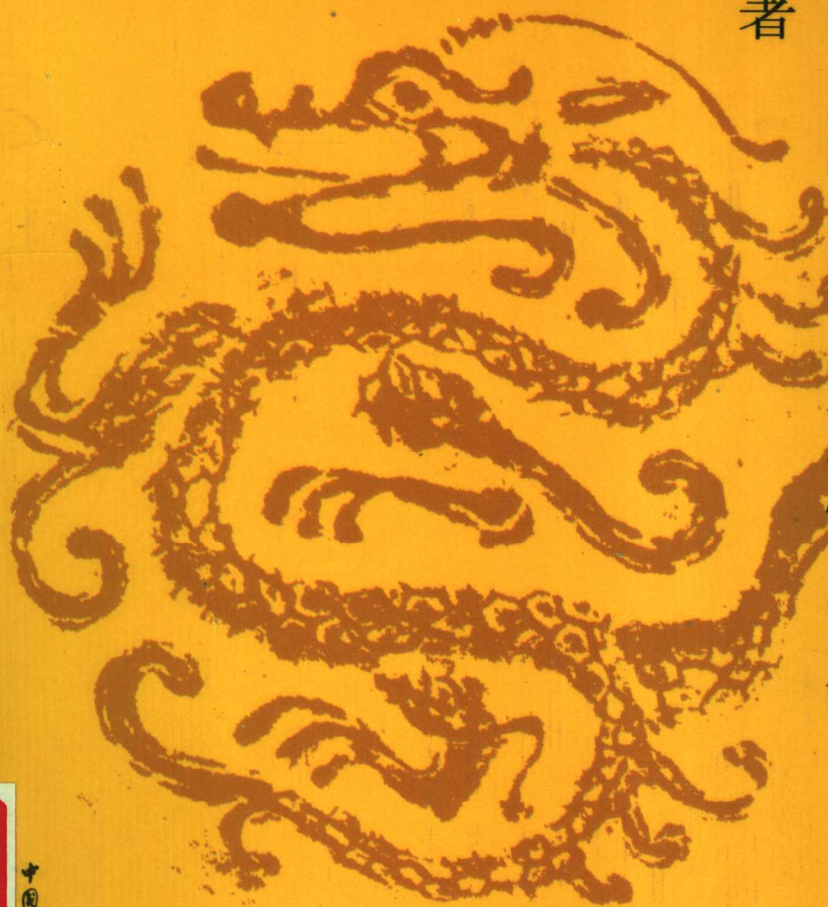


明代皇权政治研究

李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代皇权政治研究

李 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皇权政治研究/李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 - 5004 - 4460 - 5

I . 明 … II . 李 … III .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IV .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223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17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明代历史的基本状况·····	(1)
第二章 皇权概说·····	(37)
第三章 明代皇权的权力结构·····	(65)
第四章 明代皇权的政治基础·····	(91)
第五章 明代皇权政治要义探析·····	(115)
第六章 明代皇权与军权·····	(152)
第七章 明代皇权评论·····	(227)
主要参考文献·····	(264)

第一章 引言——明代历史的基本状况

皇权问题在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明代历史，无论是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的废置因革，还是一个显赫政治人物的浮沉起落，抑或是一起重大政治事件的生成转化，乃至有明三百年政局之跌宕起伏，探其因而溯其源，无不以皇权的走向为指归。明朝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监察诸大权于一身，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我们研究明代政治史，必须将皇权问题置于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但从迄今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某些表层现象上，而缺乏深入、全面、系统、多角度的分析考察。也没有一部专门性的研究著作问世。本人不揣浅陋，试图对明代皇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祈盼各位读者批评校正。

任何一种政治形态或政治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文化领域内各种矛盾冲突斗争的集中反映。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我们考察和研究明代皇权政治，必须将其置于14—17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背景之上。

明王朝自1368年肇建而底于1644年灭亡，统治中国垂三百年。

李洵先生曾对14—17世纪的明代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基本历史特点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公元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将是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之关键历史转折点，以及形成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诸因素的重大研究课题。

“公元十五世纪存在着一个以明代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世界。

“中国人一向提起中国古代史上值得称道的王朝，不是汉，就是唐。汉、唐当然不愧为各自时代的最辉煌的王朝，也曾是当时亚洲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蒙古帝国似乎具有世界性质，但元朝则不过是亚洲世界里不完全被承认的盟主。在近代西方殖民势力抵达亚洲，并破坏亚洲世界秩序之前，明代中国还称得上亚洲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外交政治中心。清代中国在亚洲世界仍保持着中心地位，但世界和亚洲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南亚、东南亚、印度洋各国、中亚各国，也就是说亚洲除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置于西方殖民势力的控制之下。此时的亚洲世界已经不同于在此之前的亚洲世界。清代中国所处的地位，虽然比较稳定，但与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相比，已经是两回事了。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十九世纪中叶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后，清代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丧失其稳定性，而日益动摇了。”^①

史实表明，14世纪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步入晚期，与以往各个朝代相比，明代的历史发展具有晚期封建社会的明显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公元16世纪顷，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和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土壤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尽管这种萌芽在当时仅仅出现和存在于个别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和少数生产部门，但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经济现象。李洵先生指出：“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究竟发生于何时，发生之后又怎样发展的，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和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认为应当发生于公元十五世纪的中叶，而且十六、十七世纪有所发展，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年，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十九世纪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进入一个被歪曲、被压抑的时期，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并未落后于欧洲，而是与之相当。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所以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我国的封建社会本身的发展就与西欧国家的中世纪历史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

① 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必然和西欧在中世纪历史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尽相同。但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最基本的要素必须具备，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运动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历史为典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史时，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无论在西欧，抑或在中国，当发生资本主义关系时，资本原始积累及自由雇佣劳动的要素的形成，都是不可缺少的。”^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即必须以农业、手工业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以及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为前提。一般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明代嘉、隆、万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明前期的百余年中，虽曾一度出现过严重的流民问题，但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力仍是向前发展的。特别在洪武、永乐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诸如奖励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整顿赋役制度，以及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针政策，使元末明初残破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迄洪武末年，无论从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或人口数量来看，都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以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为例，垦田面积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②这一数字比较可靠，因为它是在编制鱼鳞图册后统计而得的。“明编鱼鳞册，……三次编造及两核之法，积二十余年始

① 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② 《明史》卷77《食货志》。

定。”^① 这比北宋真宗末年全国垦田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超过三百二十多万顷。^② 吴晗先生曾将这一时期的国家税粮收入和人口数量与元代做了比较，兹转录如下：“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二十三年为三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六百石，二十四年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二十六年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二十六年比十八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一千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两倍。……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二十六年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③ 至永乐元年，人口更增加到六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④ 所谓“仁宣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众多、繁荣强大的封建“盛世”之一。在以农耕种植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代社会，垦田面积的增减，人口数量的升降变化，以及政府赋税收入的多寡，是衡量和判断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与否最基本最主要的三项数据标准。“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田赋》。

②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③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永乐实录》卷25，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而后赋税增。”^①从这种意义上看，明前期的社会经济较宋、元两代有了重大的发展和进步。“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②洪武年间，田赋主要征收米麦等实物，折色收入的钱钞只四百万锭左右，到永乐朝，本色收入基本上仍保持洪武后期的数额，但折色钞的收入却猛增至每年一千七八百万锭左右，^③超过洪武时期四倍多。明政府赋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以及所积累起来的大量社会财富，充分反映了明初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

此外，明代的手工业生产，如纺织、矿冶、制瓷、造船、造纸、印刷、制茶、兵器制造等行业，在生产规模、制作的技术水平，以及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上，与宋、元时期相比，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发展和提高。棉纺织业在明前期已成为普遍性的家庭副业，江南的松江、苏州、杭州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松江甚至有“衣被天下”之美誉。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已成为江南地区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人钟化民云：“（万历时）一妇每日纺棉三两，月可得布二匹，数月之织，可供数口之用，其余或换钱易粟或纳税完官。”^④金属冶炼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民营铁矿的矿课，建文四年是七万五千二百五十斤，宣德九年是五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七斤。按照当时铁冶课税率“三十分取二”计算，即民营铁矿的产量，建文四年是一百一十二万八千七

① 陈子壮辑：《昭代经济言》卷1《万言书略》。

② 《明史》卷78《食货志》。

③ 《永乐实录》卷80、108、115；参见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41页。

④ 俞森：《荒政丛书》卷5。

百八十斤，宣德九年是八百三十二万九千零五斤。三十余年间，铁的产量增加了七倍以上。可见民营铁矿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明代的陶瓷手工业以永乐、宣德两朝最盛。江西景德镇成为当时瓷器制造业的中心，所烧制的白釉及青花瓷器最负盛名，不仅畅销于国内市场，也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景德镇有民营瓷窑九百多座，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各有很细的专业分工，制造了很多优质精美的产品。特别是其中的工艺品，如传世的明初青花人物罐，“表以回纹、波涛、锦地和芭蕉、仰莲等作为辅助装饰，而以流云为背景，人物故事为主题”，可谓美轮美奂。除景德镇民窑外，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民窑，在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上，各具特色。其中著名的有：浙江龙泉、庆元等地的龙泉窑，以烧造青瓷著名，产品畅销国内外。福建的德化窑，产品胎釉乳白，光莹似玉，其中的佛像制品，造型生动，颇受国外人士欢迎和赞扬，法国人称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享有“东方艺术”之美誉。德化窑还制造碗、盏、瓶、壶等日用瓷器，远销到日本和欧洲。^①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无论其出航的目的或经济效果如何，这一事件本身的重要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②先后七次远航两大洋，与数十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所谓“西洋”的范围，大体上以现代东南亚

① 本段文字主要根据李龙潜：《明清经济史》第72页的资料，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占城国条注文。

海区为中心，西到印度洋以至非洲东海岸。以郑和为统帅的中国舰队，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扬，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①浩浩荡荡航行于太平洋、印度洋之广大海域间。如果没有雄厚的国力和先进的造船工业，没有高水平的航海科学技术，总之，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依托，要进行这样大规模、多批次的远洋航行是根本不可能的。据近人考证，郑和船队中最大的“宝船”，“长达十八丈，阔四丈四尺，排水量为1200吨。比起哥伦布的旗船排水量233吨和达·伽马航行印度的船排水量不超过300吨，确实大得多”。^②可以说，郑和的“宝船”是当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和标志。

在明前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推动之下，至16世纪中叶，封建经济渡过了前一阶段的危机之后继续发展，并呈现出繁荣景象。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其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可以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我们之所以这样表述，是因为这一时期除了表现出历史上封建经济繁荣期间通常所伴生的商品生产扩大、市场及内外贸易发展兴盛等一般性特点外，还有两个方面的现象应给予特别的注意。

第一，白银已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其数额也十分巨大。“据梁方仲先生统计，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间（1390—1486），白银的产量历年累积数至少在3000万两以上。自

① 《天妃之神灵应记》，福建长乐天妃宫石碑，另见郑天挺主编：《明清史料》上册，第403页。

② 杨宗英等：《略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本段材料系转引自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72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① 这些白银除一部分用来制造器物 and 作为储备金收藏外，大部分肯定被投入了流通领域。“海内贸易皆用银钱”。^② 而“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③ 一条鞭法中赋役折银制度的出现，无疑是与白银广泛使用这种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而赋役征银制度的推行又促进了货币的流通，从而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商业资本的积聚。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④ 在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很多人已经打破了“以末至富，用本守之”的传统经营方式，一些富商不再购买土地，“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⑤ 转而将资金投向商业或手工业，这种新的经营方式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工商业城镇，如苏州府属的盛泽镇、震泽镇、平望镇、同里镇、黎里镇、江南市、黄溪市、新杭市，嘉兴府属的濮院镇、新城镇、王江泾镇、魏塘镇，湖州府属的双林镇、菱湖镇、乌镇、南浔镇等都是专门经营丝绸纺织业的市镇。此外如松江府和嘉定府属的枫泾镇、洙泾镇、新泾镇、朱家角镇等，都是从事棉布生产

①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页。

② 谢肇淛：《滇略》卷4。

③ 《明史》卷214《新学颜传》。

④ 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

⑤ 同上。

和交易的中心集镇。类似的市镇在其他省区也有出现，如江西的景德镇就是驰名中外的瓷器制造业中心。这些城镇不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或军事据点，而是以手工业生产或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城镇。如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缁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①而太湖周边的吴江等地，则“绫绸之业，至明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②时民间有所谓“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③

大批专业化工商业城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傅衣凌先生指出：“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等。一般言之，这一种市场，范围小，流动性大，商品交换皆为短距离的农产品及一部分副业产品，有的且和族权、神权结合在一起，打上了宗教的、宗法的烙印。到了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得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这些市镇的迅速增长，差不多都在十七世纪前后。亦有原属荒僻之区，如嘉定的新泾，南汇的周浦，皆于此时前后逐渐发展成为大镇，而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我们看到这时市镇的成长过程，有不少是从偏僻的

① 万历《秀水县志》卷1《市镇》。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38《生业》。

③ 万历《嘉善县志》，据雍正《浙江通志》卷102《物产》所引。

乡村，发展为市，再发展为镇的，不仅其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在性质上，也初步摆脱了族权、神权的羁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于当时社会生产，即商业、手工业、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并成为全国性的国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盛泽、濮院、王江泾、双林、菱湖、乌镇、南浔等市镇的繁盛，即与丝绸纺织业有密切的关系。尤以盛泽镇，最堪注意。据弘治元年（1488）编纂的《吴江县志》所载，盛泽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而已，到嘉靖四十年（1561），已有‘居民百家’之语。据明末的记载，‘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①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指出：“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

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232页。

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某些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因素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16世纪顷，在商品经济异常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系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态和起始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一般发生在封建社会晚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这样表述的：“在我们考察的资本主义低级阶段中，手工业者通常还几乎没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在使农民分化日益尖锐和加深的过程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富裕的和殷实的业主开设作坊，从农村无产阶级中雇用工人，积蓄货币资金来从事商业和高利贷业务。相反地，贫苦农民的代表者则提供雇佣工人、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以及受商业资本势力压迫最甚的低级的手工业者——小业主。因此，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使资本主义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使这种关系从工业扩展到农业，或从农业扩展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工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374页。

同农业的分离，在这个阶段上表现出来的还是萌芽状态。”^①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② 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实材料很多，尤以江南地区的丝棉纺织业最为集中和典型，兹列举数则以资说明。“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③ “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则此辈衣食无所矣。”^④ “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⑤ “穀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贮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8页。

③ 《万历实录》卷361。

④ 乾隆《苏州府志》卷3。

⑤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4。